

广东外贸越千年

广东外贸一千年：以历史照亮新程

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实习生 李岑 本版统筹/朱绍杰

大咖开讲

中大教授安东强解读 广东外贸制度 这样演进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娇娇

10月15日下午，“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同主题系列讲座开讲。在广东省博物馆一楼学术报告厅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教授带来以“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体制脉络”为题的首场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安东强的讲述从广东人的“生计密码”切入。他表示，早在秦汉时期，不同于中原百姓以农耕为生，广东滨海人群“向海而生”，这是当地人日常的生活结构和天然的生产方式。后来朝廷发现，海上贸易能带来白银、特产等收益，还能通过收税充实财政；另外，管控好海上贸易，也能减少海盗、走私，稳定海疆。所以，朝廷慢慢把滨海人群的生计纳入管理，变成王朝事业的一部分。由此，广州在海外贸易中的枢纽作用逐渐被朝廷重视起来，滨海人群自发的生计行为也有了制度约束，“广东外贸一千年”登上历史舞台。

安东强表示，自古以来，广州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座重镇，这离不开其地理与气候优势。“广州是进入中国沿海的首选或重要枢纽之一，而且广州及周边地区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受台风袭扰的程度很小，航行安全性更高。”他打趣道，“要相信古人的智慧。”

15世纪末，哥伦比亚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大西洋与广东有了贸易上的“双向奔赴”，长久以来作为海上贸易链条的“西洋”（印度洋）被“大西洋”所取代。“古代中国用铜钱，但海上贸易更爱白银，不仅值钱还能当压舱物。”安东强指出，白银是跨洋贸易往来的关键。

随着海上贸易越做越大，“怎么管”成了朝廷的难题。“难的不是管贸易本身，真正让朝廷头疼的，是怎么管好那些来做生意的外国人。是古代中国朝廷不排斥外国人，但是华洋杂居是统治者不能接受的，分地而居成为管理办法。”安东强介绍，例如，唐宋时期设有蕃坊专供外来者居住，明代澳门成为了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明代”当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朝贡接待应酬是笔很大的开销；二是民间海上贸易如果按照宋代办法征税，当地官员很吃力，因而不再按照货物，转而依据船只吨位等征税。这是广东当地官员变通的办法。”安东强进一步解释，海上贸易首先要保证朝廷、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人三方获利，才能持续运行。

到了清代，康熙时解除“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康熙认为开海贸易不仅于民生有益，全国各省都能受益，向富商大贾课税可充固粤兵饷，减轻内陆省份经济负担。”安东强说。

乾隆时期则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将对外贸易的管理集中于粤海关。“十三行成为了皇家贸易代理人”，安东强认为，“一口通商”非传统认为的“闭关锁国”，而是清政府对西洋贸易管理方式的调整。”由此，广东形成了以广州为核心、粤海关监管的十三行垄断体制为基础的外贸体系，这深刻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中西贸易格局，也是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安东强教授带来精彩演讲



清乾隆款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亮相专题展
羊城晚报记者 邓鼎园 摄

“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以文物实证与制度演进的双重叙事，全方位展现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
视觉中国供图



如果说，中国外贸史是一部奔流向海的史诗，那么，广东无疑是这壮阔篇章中一艘劈波斩浪的“先行之舟”。

10月15日，第13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盛大开幕当天，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在广东省博物馆正式开展。

历史与当下在此交汇，静态的文物展陈与动态的贸易盛会相互映照，共同诉说着广东从古至今“向海而兴、互利天下”的不变初心、未来航向。

实证千载传奇非凡智慧

广东外贸的千年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制度探索与文明交流史。早在秦汉时期，徐闻、合浦等港口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至唐代，朝廷不仅设立市舶使专掌海贸，更在广州创设蕃坊容纳外商聚居，展现出大国开放的制度智慧。宋元时期，海洋贸易政策更为积极，《广州市舶条》等法规的出台，标志着管理趋于规范化。明代推出“广中事例”，将澳门租居予葡萄牙人，形成“以夷制夷”的贸易窗口。清代虽行海禁，却延续广州“一口通商”体制，使广东始终保持着对外交往的窗口作用。近代以来，许多粤人“下南洋”谋发展，构建起跨越海洋的商贸与文化网络。

此次展览中一枚唐代波斯商人的遗产“伊婆那银铤”，正是广东外贸管理

智慧的早期见证。伊婆那来华贸易，于大历末、建中初客死广州，其遗产因三个月内无亲属认领，被官府接管，由负责广州外贸管理的岭南节度使和市舶使进献上供。

这一过程，恰是唐代应对海外贸易拓展、完善外商管理制度的缩影，反映出安史之乱后，由岭南节度使与市舶使共同执掌海外贸易事务的格局。这枚小小的银铤，也成为唐代广东作为国际性贸易枢纽，其管理制度日趋精细和成熟的实物见证。

“在广东这样潮湿的地方，一件北宋的木雕能完整地留存下来，是非常难得的！”展览现场，注视着—尊来自南华寺的北宋木雕罗汉像，一位观众感慨道。

更让观众惊叹的是，这座罗汉像蕴含千年前岭南外贸的丰富历史信息。罗汉像底座正刻有铭文“广州纲首陈德安舍尊者奉为先妣梁十五娘生男”。纲首，是宋代远洋贸易船队的首领和巨商。陈德安此举，既是一位成功商人的孝心表达，更是宋代广东民间航海贸易力量雄厚、商贾社会地位提升的生动写照，反映出当时的海上贸易已形成了具备成熟运行机制的民间力量。

透视开放广东不息引力

专题开展当日，来自泰国的一家三口前来观展。据了解，这个家庭里的父亲已在穗工作生活多年，此次趁广交

会开幕之际特意将家人接来团聚。“现在过来很方便。”他之前参加过两次广交会，对广东活跃的商贸氛围印象深刻，这次不仅专程带泰国的家人来感受这座千年商都的魅力，更通过展览了解广东千载外贸史。

这个泰国家庭的广州行，也是广东外贸活跃千年、至今仍对世界保持强大吸引力的生动缩影。从唐宋蕃坊包容四海商贾，到明清特许通商汇聚全球货殖，再到今日广交会搭建互利平台，广东始终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

截至本届，广交会已成功举办138届，累计到会境外采购商超900万人次，出口成交额逾1.5万亿美元。这届展会更是创下历史新高——展位总数达7.46万个，参展企业超过3.2万家，其中约3600家企业为首次亮相；来自21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24万名采购商登记参会。这座跨越千年的开放之都，依然在全球贸易中焕发着蓬勃活力。

尽管是工作日，展览开幕首日仍有许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除本地市民外，不乏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钟同学表示，“尤其触动于广东外贸史上的多元审美”。在展馆中，她还了解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在17至19世纪的欧洲，一场名为“中国风”（Chinoiserie）的文化热潮席卷艺术与生活领域。欧洲贵族通过瓷器、漆器与壁纸，迷恋上一种充满异域情调的中国幻象，然而真正的思想交流却因地域与语言的阻隔而进展缓

慢。在此背景下，一批试图深入理解中国文明的著作应运而生。如法文版的《史记》试图解读中国的历史智慧，英文版《广州旅游指南》则成为远道而来的商旅的实用读物。这些书籍与外销商品共同构成欧洲“中国风”的一体两面：一面对东方美学的向往，另一面是对中华文明的探求。

以文物说话，以历史雄辩。广东不仅是地理上沟通中外的“南大门”，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从千年外贸实践中淬炼的契约精神与开放品格代代相传，早已奠定广东在全国乃至世界贸易史上的独特地位。

开启外贸史探析新航程

本次专题展是对辉煌过往的一次系统梳理，更是探寻广东开放基因、启迪未来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广东的千年外贸史，是一部始终鲜活的历史，其生命力不仅蕴藏在文物与典籍之中，更延续在今天每一项制度创新、每一次商贸往来、每一份合作共赢的实践里。

展览开幕后，2025年10月至12月，2026年3月至9月，“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主题系列讲座将每月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讲座将邀请国内十位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主题演讲，深入挖掘广东外贸从唐宋市舶制度到现代广交会的千年历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余心玳：

广东用千年实践证明，开放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力量

专家访谈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10月15日，“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第138届广交会同日拉开帷幕。在这一历史坐标的闪耀节点，我们应如何理解“开放”的深层内涵？广东外贸的独特基因，能为当今世界提供怎样的中国智慧？带着这些问题，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余心玳。

羊城晚报：您觉得“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有怎样深远的意义？

余心玳：此次展览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梳理，也是一场关于历史如何启示当下开放的思考。以物证为线，以时间为轴，将广东与世界的交往重新置入文明史的坐标系之中。展览让我们看到，贸易并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一种贯穿千年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不断建立互信的过程。

羊城晚报：通过这场展览，我们能够

看到广东外贸什么样的特点？

余心玳：广东的外贸历史具有独特的连续性，岭南的开放几乎未曾中断。地理上的临海向南，使它天然与外部世界保持接触；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则使这种接触不止于交易，更延伸为认知和理解。展览以丰富的实物证据展示了这种连贯的轨迹——陶瓷、铜镜、广彩、外销画、航海仪器，这些物品的流向与形制变化，正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视觉记录。通过它们，可以读出广东外贸的三个底层特征：实用理性、开放格局与互利精神。

首先，广东的外贸始终建立在务实理性之上。无论是早期的海上互市，还是后来的制度化贸易，广东商人和工匠都以精确的成本意识和灵活的市场判断著称。他们的“理性”并非冷漠的计算，而是一种长期合作所需的信任逻辑。展览中许多文物的背后，是对契约精神的早期实践——用质量赢得信任，用信誉维系往来。这种经验后来成为中国外贸文化的重要基因，也为近代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奠定了心理和制度基础。

其次，广东的开放不是被动的结果，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展览突破了以近代通商为主的叙述框架，将视野前移至秦汉、唐宋时期的海外往来，呈现出广东外贸历史更为深远的连续性。这种重新梳理让人意识到，中国的开放并非近现代的应对策略，而是文明自发的表达，是一种面向外部、兼收并蓄的社会文化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广东能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始终保持与外部的联通。开放因此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更是一种历史性的自觉。

再次，广东的外贸实践始终强调互利共生。展览主题“互利天下”并非修辞，而是对这一精神的凝练概括。在漫长的交流过程中，广东商人深知持续的贸易必须建立在利益共享与相互尊重之上。互利不是短期的交易平衡，而是长期合作中形成的稳定秩序。从唐宋时期多民族商人共居的市舶，到近代中外合办的工坊与洋行，广东的对外贸易往往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到平衡，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制度弹性。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外贸的发展历史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启示？

余心玳：广东外贸史所揭示的，不仅是商品交换的轨迹，更是一种长期的交流经验。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往来中，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以沟通化解隔阂、以合作扩大共识的开放取向。这种面向世界的实践，并未削弱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反而使开放成为一种更具自觉的选择。在开放中形成的“多元共存”现实经验，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全球化并非外力输入，而是一种长期自我调适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广东外贸的历史并不是单纯的“发展史”，而是一部关于学习与适应的历史。每一阶段的外贸变革，都伴随着制度学习、技术吸收和文化再创造。从航海技术的改进、度量衡的统一，到合同、汇兑制度的引入，广东不断在吸收中重组自身结构。它既不是被动接受西方规则的边缘地带，也不是封闭自守的孤岛，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实验的开放空间。这种实践经验，使广东能够在新时代的对外贸易体系建设中迅速找到方向——以规则为基础，以

互利为目标。

此次展览的价值还在于，它让人们重新理解“开放”的多重维度。开放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市场进入，也包括观念上的包容与制度上的创新。历史中的广东之所以能持续繁荣，是因为它在每一次环境变化中都能找到新的平衡点。面对外部压力，它既保持自信，又愿意学习；面对市场波动，它既重信用，又敢于创新。这种弹性开放的能力，正是当下中国外贸在复杂国际格局中所需要的品质。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开放不是一次性的政策决断，而是一种长期的文明选择。广东用千年实践证明，开放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力量，而互利则是维系这种开放的精神内核。

当世界再次进入变局期，广东的故事仍在提供可资借鉴的答案：开放不是风险，封闭才是；理解他者不是妥协，而是智慧。展览的举办，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一种持续的召唤——在全球互联的新阶段，中国的开放精神仍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写下去。